

陆游与严州

◎方明华

地以人重,人以文名。两宋以来,睦州(严州)之所以能被称为望郡,与一些文人墨客流寓睦州(严州)不无关系。作为中国历史上现存作品最多的诗人,陆游曾于南宋淳熙十三年(1186)出知严州,从而为睦州(严州)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。

(一)

陆游(1125—1210),字务观,别号放翁,越州山阴人,生于北宋宣和七年(1125)十月。

陆游出生于宦宦之家。祖父陆佃,是王安石的门生,一度任尚书右丞。蔡京当道时,受到排挤,于亳州知州任上离世。其父陆宰曾任直秘阁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及京西路转运副使,长兄陆淞官至知郡,次兄陆浸官至通判。由于生活优渥,耳濡目染,陆游从小就表现出了对于诗文的爱好,《宋史·陆游传》称其“年十二能诗文”。期间,他师从江西派著名诗人曾几(“东南三贤”之一吕祖谦的外祖父),十六七岁时就已声名鹊起。

正是由于出生于宦宦之家,所以他得以“荫补登仕郎”。然而,其科举之路并不平坦。绍兴十三年(1143),他第一次赴临安赶考,名落孙山。绍兴二十三年(1153),陆游又赴临安应考。此时,他诗名已著,许多人都认为魁首非他莫属。但不巧的是,时任丞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也来应考,当时秦埙已官居敷文阁待制。宋时尽管已施行科举取士制度,但荫补(恩荫)制度并未废除。所谓荫补(恩荫)制度,即官宦子弟可不通过科举考试,受恩荫即可授予官职。像陆游任登仕郎、秦埙任敷文阁待制,就是得益于荫补(恩荫)制度。

宋时想要做官,主要通过三种途径,分别为科举考试、恩荫(皇帝授予高官子孙、亲属官职)和军功。其中,科举做官地位最高,称为“有出身(即进士出身)”,通过其他途径做官叫“无出身”。进士出身的官员升迁快,而通过恩荫做官的人升迁慢,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官职没资格担任,这就是陆游、秦埙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。

因此,为了满足官员子弟的现实需要,朝廷设置了专门的考试,这种考试即称“锁厅试”。“锁厅试”通过后,再参加省试、殿试,直至取得进士资格。清代袁枚《随园随笔》卷十载:“宋现任官应进士试曰锁厅,言锁其官厅而往应试也。”起初“锁厅试”要求很严格,如果考不中已有的官职要丢掉,但后来限制就慢慢放松了。宋时,正常的科举考试分为取解试(州试)、省试、殿试,因此“锁厅试”实际相当于“取解试(州试)”。

秦桧本拟通过“锁厅试”“直欲首送”其孙秦埙,而后再通过省试、殿试,让秦埙博取状元及第的功名。但主试官两浙转运使陈子茂较为公道正派,他将陆游“擢置第一”,而将秦埙列在次席,惹得秦桧大怒。第二年(绍兴二十四年,1154),陆游参加礼部省试,主考官员再次将陆游名次列在前列,但被秦桧黜落,失去了参加殿试的机会,与进士失之交臂。“试礼部(省试),主试复置(陆)游前列,(秦)桧显黜之……”(《宋史·陆游传》)。《光绪严州府志》说陆游被“锁厅荐送第一,以忤秦桧被黜”,说的就是这件事。但秦埙只考取了第三名探花,因为宋时规定,通过“锁厅试”考中进士的人不能当状元。将陆游“锁厅试”“擢置第一”事,使陈子茂“几蹈危机”。幸亏在陆游被黜落的第二年,即绍兴二十五年(1155)十月,秦桧即去世,否则对陈子茂、陆游来说,不知又要生出多少波折来。

绍兴二十八年(1158),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,正式踏入仕途;一年后,调任福州决曹(司法官员);又不到一年,即绍兴三十年(1160)调往临安,任敕令所删定官,负责已公布法令的编纂。虽然官职不高,但因在临安,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朝廷,与一些高官往来。此后,他又升任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,宋孝宗即位,陆游调任枢密院编修官,兼编类圣政所(《光绪严州府志》为“编数圣政所”)检讨官,负责太上皇高宗赵构政绩的编撰(因太上皇仍活着,不能称实录,而称圣政)。此时,陆游盛名已久,人称“小李白”。此年十月,在权知枢密事史浩和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两人的推荐下,孝宗赐陆游进士出身。

宋孝宗是一位非常有抱负的皇

在临安时,陆游与右丞相史浩来往密切,史浩和他谈起了宫中的琐事。孝宗一次内宴,史浩、曾觐在座。此间,一位宫娥请曾觐为她的手帕题词,但当时德寿宫(太上皇赵构居住的宫殿)一位专管果品的内臣与宫娥有来往发生问题,交给法司讯问,因此曾觐说:“不敢,不敢,没有听到德寿宫的公事吗?!”史浩将这件事告诉了陆游,陆游又告诉

乾道元年(1165)夏,陆游调任隆兴府(南昌)通判。乾道三年,言官弹劾他“交结台谏,鼓唱是非,力说张浚用兵”,被罢官。此后入川,先后任夔州府通判、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、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、蜀州通判、摄知嘉州、摄知荣州、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等职。淳熙三年(1176),言官称陆游“燕饮倾放”,又遭罢官。自此始,陆游自号放翁。领祠禄,被任命为主管台州桐柏崇道观。宋时,“主管”或“提点(举)”某官某观,是一个领取干俸的差事,无需真的到场。像“提举”,可以支取半俸,每任通常为二年,可以不断地连任。所以,直到淳熙五年(1178)春奉调

按宋制,官员任期一般为三年。从淳熙十三年(1186)春被任命为严州知州,七月到任,到淳熙十五年(1188)七月离任,陆游在严州待了三个虚年,其任职还算相对正常。

陆氏一族与严州应是有缘的,陆游高祖陆轸早在130年前即出知睦州。陆轸,北宋仁宗皇祐年间(1049—1054),“自会稽移守新定(即睦州),有声,期年请老,得分司西京以归”。在严州任上,陆游应建德县令苏林之请,为陆轸在兜率院修筑了祭祠(《光绪严州府志》卷十二“遗爱上”)。后来,到了理宗宝庆

帝,他不甘心于南宋偏隅江南,颇想有一番作为。南宋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,从皇帝所取的的年号即可看出朝廷政策的变化,年号的转变就意味着政策的转变。孝宗即位后第二年,改年号为隆兴,是为隆兴元年(1163)。“隆兴”年号系从宋太祖“建隆”年号和宋高宗“绍兴”年号中各取一字而成,意在振兴图强。因此,即位之初,孝宗皇帝便重用张浚等主战派,发动了对北方女真金的战争。

南宋时有两次主动的对金作战,即张浚北伐和韩侂胄北伐,这两次北伐均因仓卒出兵、准备不充分而失败。张浚北伐发生在隆兴元年(1163)五月,战争只进行了十天时间,宋军先胜后败,最终被金兵大败于符离县。隆兴二年(1164)三月,作为主战派的张浚被罢右丞相及其

了参知政事张焘。

曾觐、龙大渊是孝宗皇帝没有立为太子以前的门客,出入孝宗内廷较为方便。隆兴元年(1163)三月,孝宗皇帝有意将曾、龙二人提拔任用,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。恰巧张焘进见,孝宗原指望张焘支持,但张焘竟说:“陛下初即大位,不宜和臣下燕狎,一至于此。”本来,皇帝与臣子内宴并没有什么,

入京,陆游一直待在四川。“无端更渡桑乾水,却望并州是故乡”,盘桓已久,蜀地已成为陆游的第二故乡,此番离开怎不令他生出无限的眷恋之情。

到临安召对后,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,后又调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(任所江西抚州)。淳熙七年(1180)岁末,又遭给事中赵汝愚弹劾落职,挂闲职“主管成都府玉局观”返乡而去。蛰居故乡五年后,淳熙十三年(1186)春,陆游有了朝奉大夫(正五品)、知严州军州事的任命。

因陆游此时并非京官,所以出知严州不算是贬谪。据合理推测,陆游出知严州,当与好友周必大有

二年(1226),陆游的小儿子陆子通又出知严州,三年后离任,任上始创钓台书院(《景定严州续志》)。

在严州任职期间,有两件事情对陆游影响很大。第一件事是淳熙十四年(1187)八月,陆游年仅两岁的女儿夭折,令他悲痛欲绝。第二件事是同年十月太上皇高宗去世。高宗去世,对于陆游等主战派来说,应是排除了一大障碍,本是一件好事,但此时的孝宗已不复之前的雄心壮志。陆游在严州删定的《剑南诗稿》,无一诗提及高宗去世之事,显然不太正常。估计,此时的陆游对孝宗也已经非常失望。

江淮都督府,八月去世。此后,宋金开始和议,至年底和议签订,宋对金以侄相称,割地赔款,史称隆兴和议。

宋金和议固然是时势使然,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。孝宗并非高宗的亲生儿子,也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,他对高宗极为孝顺(庙号孝宗即缘于此)。当时,高宗虽已逊位,但作为太上皇,他还要干预朝政。高宗既然想与金和议,孝宗对金也只能以屈辱换取暂时的相安无事。

陆游向中书省和枢密院递交《上二府论都邑札子》,发生在隆兴二年(1164)八月张浚去世之后,隆兴和议将成之时。宋人南渡以来,对于建都一直都存有两种不同的主张。主和派认为建都临安,不至引起金的猜疑,而且一旦金南侵时,可

(二)

氛围较为宽松也是人之常情,但张焘竟将此提升到了“燕狎”的程度。燕狎之意,是指饮食轻昵、不庄重,暗指曾、龙二人为宠臣,“招权植党,荧惑圣聪”。孝宗问张焘是如何知道的,张焘如实相告。孝宗听后非常愤怒,贬陆游出京,“除左通直郎通判镇江府”。《光绪严州府志》说是出判“建康府”,实误。查《陆游年谱》(于北山著,上海世

(三)

关。淳熙十一年(1184)六月,周必大由知枢密院事升枢密使。枢密使主管军事,形同宰相。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位权臣的通融推荐下,孝宗不可能会起用陆游。

孝宗皇帝对于陆游的任用,给人一种“不可不用不可重用”的感觉,“不可不用”和“不可重用”皆是陆游诗名太重的缘故。在孝宗的心目中,陆游多半是一位文人(诗人)的形象,孝宗即位后即任命他为参政所检讨官,以及因他“善词章、典故故”而赐他进士出身,即为明证。陆游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,他在《严州到任谢表》中即说:“臣闻明主恩深,书生命薄。唐帝之知李白,一官不及于生前;汉

(四)

陆游一到严州,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,严州遭遇了饥荒。身为新任州牧的陆游,免不了阵手忙脚乱。因此,有着切肤体验的陆游,对于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极为深刻。在严州的三年间,他连续两年(淳熙十四、十五年春)发布了“劝农文”,鼓励百姓顺应农时,勤于耕作。宋时,商品经济相对发达,民间矛盾纠纷较多,以致“好讼”成风,陆游即有诗称严州“讼氓满庭闹如市”。因此,一方面陆游规劝百姓要“无事未作,无好终讼”,勤于农事、不误农时,“享无事之乐”;另一方面,他期望官员们要提升“断讼”能力和水平,尽量减少诉讼办理时间,为百姓营造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。当时,严州下辖的遂安知县王时叙是一位“断讼”能手,为陆游所称颂。王时叙去世后,陆给予高度评价:“学道爱人,正心诚意。惴惴(意“至诚”)无华,儒雅饰吏。子之自著,古人何愧!”可惜,检析清末民国府县志,未见此人,其任遂安知县起迄时间不明。

为官处事,贵在尽心;惟有尽心,便会有愧。严州百姓“大抵安于简易之政,抗之则生事”(《严州图经》“风俗”),陆游深谙严州历史及风土人情,因此他“不喜以土木无益

以随时逃亡,以免屈己投降。主战派则极力反对建都临安,主张建都关中、南阳,最不济也要建都建康,认为从建康渡江,通过皖北,可以随时收复东京(开封)。陆游系坚定的主战派,力主恢复中原,所以他强烈主张建都建康。在给二府的札子中,陆游详尽分析了临安、建康建都的利弊,力陈建都建康的主张。《光绪严州府志》所录“自吴以来,未有舍建康他都者。驻蹕临安,出于权宜。形势不同,馈饷不便,海道逼近,凜然意外之忧”等语,是陆游上书二府札子的精华。

隆兴年号用了两年后,即从宋太祖“乾德”和宋太宗“至道”两个年号中各取一字,改年号为“乾道”。此时,隆兴和议已成,和局既定,再提振兴图强的口号显然已不合时宜。

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6月版),应为镇江府通判。后来,陆游屡受曾、龙等辈打击,肇始于此。

由此可以看出,曾觐、龙大渊事应是发生在陆游上书主张建都建康事前,《光绪严州府志》将两事叙述顺序前后颠倒,恐为不妥。此外,隆兴元年五月间发生的张浚北伐,陆游并未参与。

皇之念相如,遗稿徒求于后。况如臣辈,敢望昔人?猥缘一技之卑,尝缀百僚之末。”话说得很委婉,但内心不免有种失落的味道。在陆游出京照例“陛辞(上殿与皇帝辞行)”时,孝宗皇帝“亲降玉音”“勉以属文”：“严陵山水胜处,职事之暇,可以赋咏自适。”陆游给孝宗的印象,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严州图经》“风俗”记载,“州境山谷居多,地狭且瘠,民贫而蓄,谷食不足,仰给它州。惟蚕桑是务,更蚕茶割漆,以要商贾懋迁之利。”严州位于临安(杭州)的西部,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总量,均非当时重镇,估计这也是孝宗能任命陆游出知严州的原因之一。

之事劳其民”,其任内没有什么所谓轰轰烈烈的大事,也就很正常了。“居官多惠政,既去而民思之”,此语固然有一定的溢美成份,但毋庸置疑,陆游是尽心尽责的。在严州期间,“吏牒围坐高于城”(陆游诗),公务非常繁忙,也许是志不在此,陆游很快就厌烦了,任期将满他就上书乞求祠禄,准备返回故乡。

遗憾的事还是有的。嘉泰四年(1204),即陆游离任的十六年后,朝散郎、直秘阁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孙叔豹奉召出知严州。因景仰严子陵高风亮节,到任后孙叔豹不忍钓台严子陵祠废祀,于是于祠旁购田百亩,将田产收入作为严祠每年祭祀的费用。购田后,孙请陆作记勒石。严州素以厚重的人文历史而被称为望郡,早在北宋景祐间,范仲淹出知睦州时,即在钓台重修了严子陵祠,购置了田产,并亲自撰写《严先生祠堂记》,留下了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的名句。作为文人(诗人)的陆游,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,显然对于任内未解决严祠一事深感愧疚,自责不已。于是,对于孙守的请求,他欣然应允,作了《严州钓台买田记》,内云“予二十年前(实不到二十年),盖尝来为此邦,亦自咎者之一也。”

